



LINGDAO GANBU
GUANZHU DE WENHUA REDIAN WENTI

领导干部 关注的文化热点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LING DAO GAN BU GUAN LU DE WEN HUA RE DIAN WEN TI

领导干部

关注的文化热点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导干部关注的文化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文史
部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035-3116-9

I. 领… II. 中…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342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北京奥达福利装订厂装订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 9.125

字数: 254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序

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石泰峰

一、充分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机遇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文化工作都是党的总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取得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影响力和创造力。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成功地成为执政党，并执政几十年，文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对我们党的文化感召力、影响力和创造力，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认识。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要得民心，而得民心就要有文化的凝聚力。能否提高党的文化凝聚力是对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重大考验。因此，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文化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提了出来。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变了，党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变了，党的任务变了，所以我们要研究和关注的文化问题必然也会发生变

^{*} 本文为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同志 2004 年 8 月 2 日在四川成都全国党校系统“科学发展观与文化建设”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化。可以说文化已经前所未有地渗透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而且我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日益深入到文化的核心层，比如这次会议要讨论的科学发展观问题、道德观问题、思想意识问题、审美取向问题等等就是如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对正在发生着的这么深刻的变化，我们对文化建设的理解，当然也应该更加深刻、更加深入。否则的话，我们在工作中就要被动。深入研究我国现实的文化问题，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在社会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方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要讲“五个统筹”。我们所理解的“五个统筹”绝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深层次的就是文化问题。我们的改革已推进到制度创新的阶段，而一个制度的创新，必须有文化创新的支撑。没有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不可能实现，没有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就会降低到技术层面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更深刻、更全面地去理解。在这方面，我们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联系文化创新看待制度创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具有和已经具有的高度的文化自觉。

还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开放，这样的交往频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它所带来的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交汇、融合，文化的碰撞、交锋和文化的矛盾、冲突，都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因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正在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一方面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在新的发展平台上，正共同享受着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和交往中又确实有个如何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实现文化创新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能继承本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就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失落自己，找不到自己。继承只能是在创新意义上的继承。我们必须创新，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没有自己的文明

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融合中，这一点尤其值得引起注意。

对于当今的文化态势，应该说人们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人比较乐观，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化共享的时代，也有人比较悲观，担心我们的文化特色会被强势文化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所吞没。的确，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危机，同时更突出地面临的是文化的危机，诸如文化应当如何继承，文化应当怎样创新，甚至是文化如何保存等等。别人有的问题，我们全有，别人没有的问题，我们也有。今天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比过去更加严峻，我们所面临的文化矛盾比过去要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可以说，中华民族今天所遇到的挑战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以，我们要认真思考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既对得起祖先，又对得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是无法回避的难题。要研究怎样既保持文化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使世界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交流、丰富，同时又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和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使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本来就应该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导向作用，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难题。我想，这些难题都是挑战，但更是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大家研究文化问题，搞学科建设，首先就要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明确我们党所面临的机遇。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肩负起历史的重任，真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目前世界所呈现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正带来各种利益之间的新的冲突与磨合，需要我们从文化层面上认真加以思考。改革开放 20 多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发展是不全面的。讲不平衡，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还不平衡，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不平衡，所以科学发展观要讲“五个统筹”，要统筹经济、

社会的发展。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机遇，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性。然而，当前有些干部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建设总认为难度大，也不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投入，对于抓硬指标、抓GDP决心容易下，也重视得起来，办法也比过去多。而对于搞文化建设，就不那么重视，或者也不能说不重视，但办法不多，行动难以落实。也有一些干部对文化的理解、对文化建设的理解深度和广度都不够。一说搞文化建设，就是搞几台歌舞、几台晚会，或是抓几部电视剧。以为领导干部坐在那里，就是重视了，这样的认识还是浅层次的，也比较片面。

再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城市化本身就是文化问题。不是说马路修宽一点，多建些高楼，然后农民进了城，都变成城市居民，我们的城市化就实现了。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城市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转型。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形成新的文化意识、文化标识和文化形象。然而，在有些地方的城市化过程中，又有多少文化含量在里面呢？城市化不只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设。有的城市建了好几个文化广场，但没有多少文化感。所以，在今天，更多更深层的问题，都亟待我们从文化层次上去加以研究和解决。

看看我们今天城市发展中的某些现象，就证明我们的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确实不能没有文化的参与。在时代为我们提供的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前，我们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文化意识，不断推进文化创新，从而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二、充分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讲机遇，机遇同时也就是挑战，应当充分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严峻性。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文化问题、从事党校文化教学的同志来讲，机遇和挑战是同时并存的，这么多的文化问题摆到我

们面前，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答，这对党校教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

如何迎接这种挑战？首先，我们应该有强烈的文化问题意识，要关注当代中国真实的文化问题，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真正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结合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大现实问题搞好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自身学术修养，还要研究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提高党校系统文化学学科建设水平的关键所在。其次，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党校教学水平的提高是和党校教员的素质和能力分不开的。今天党校的文化课，和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时的干部主要是补习文化知识，现在除了文化知识还要学文化理论、文化建设理论。现在的学员总体水平大大提高了，在某些方面，他们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掌握的还多，如果我们不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理论水平，那么我们在课堂上能给他们什么？我们说现在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道理就在这里。第三，加强文化研究的针对性，处理好学术性和针对性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文化研究不应是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我们要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现实的而且是迫切的文化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学术修养，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古今中外。如果我们只呆在书斋里，不研究现实，我们的视野就打不开。我们不去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也就不可能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

作为党校教员，我们要时刻问一问自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领导干部所关注的文化问题是什么？我们又该从哪种角度提出问题和他们讨论？很多似乎不是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文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提高自己的问题意识，并进行学理化梳理。这样我们才能和学员有共同语言，才有互动的平台。否则我们关心的学员不关心，学员关心的我们又不关心，这是我们党校系统从事文化教学、科研的同志们应该认真加以避免的。这件事处理不好，我们的教学、科研就会出问题。我们要认真下大力气，向我们的学员同志学习，向他们搞调查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当代中国文化问题的真实所在。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是真正体现教学相

长的原则。

今天，党校文化学科的队伍根本不存在保留不保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支队伍应该怎样更壮大一点，教学水平、科研水平怎样更提高一点。过去大家更多想的是怎样有“位”，是位置问题，现在更多地要讨论怎样有“为”，而且是大有作为。我们要把精力放在不断提高研究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放在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课堂效果上；放在深入了解现实、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上；放在深入研究文化传统，了解世界文明上，这样我们才能大有作为。

从今年开始，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进修部 A 班设有文化建设问题研讨班。这些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两个月，就是专门来研究文化问题的。由于总体教学布局的调整和文化建设问题研讨班的设立，现在中央党校文化建设方面的课程量空前地加大了，过去只是一两次，后来发展到完整的单元，现在又发展成专门的研究方向。大家为这样的机遇高兴，但我们更要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特别是文化建设问题研讨班提出的挑战的严峻性。两个月的研讨班里，很多领导干部同时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真实文化问题的了解程度、认识程度还不如他们，那我们就很难和他们真正交流，很难和他们真正地去讨论。过去只是传授知识，现在则是问题研究，我们的教学对象在变，学员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学习能力和过去不一样了。这些变化也必然给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学带来变化，所以我们也得变。我们党校的学科发展方向、课程设置、研讨方式，包括学习效果的检验方式，也要与时俱进。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教员同志，要真正按照教学改革的要求，以提高素质和能力为核心，加强对学员的培养。在文化教学中，还要有新的方式、新的思路，不断做出新的创造和新的成绩。

党校的这支队伍精神状态是好的，文化学的学科发展前景也是好的。在今年的学科发展调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整个学科目录上没有文化学，只在人类学里设有文化人类学。

但我们不能非要等到别人把自己放到哪个框子里才能做事情。文化问题本身就是综合性很强的，我们可以从各个学科角度去研究。当然我们这支队伍从相对明确、稳定的角度去研究文化问题，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说文化问题的特殊性和综合性对我们的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了解和把握，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度。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加以认真关注和研究的。希望大家共同承担起责任来，为我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目 录

MU LU

序 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石泰峰/1
全球化、认同危机与文化建设	赵伯英/1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张筱强/34
改革开放的文化意义	周照明/52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力问题	尹永波/66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强势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	刘 婷/77
“全球化”概念的陷阱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创新	秦 露/86
“美标”失效了吗	李文堂/102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和地 位刍议	刘悦斌/109
17—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作用	岑大利/129
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赵 峰/140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	李文堂/153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人民性”认识过程的再	

认识	刘 忱/166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意义的转换	陈宇飞/176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谢武军/204
认识宗教文化特征，做好党的宗教工作	徐 平/214
地域文化与区域发展	张宏明/245
大众文化生成的语境分析	范玉刚/257
对视觉文化批判的反思	惠春琳/272
后 记	/280

全球化、认同危机与文化建设

赵伯英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福利时，“开眼看世界”，惶惑地提出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是谁？”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出现了普遍的“认同危机”问题。国内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20 多年，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也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到深刻的影响。日益显现的认同危机问题引起许多人的忧虑。无论如何，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和“位置”，就必然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本文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说起，然后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的挑战，进而探讨推进民族现代文化建设和强化固有认同问题。

一、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所谓“认同”（identity），是指一种身份，表明一种归属，同时也是对一个群体承认并效忠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社会中的群体是多样的，人们可以有多重身份认同。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①民族（nation）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

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而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因此除了个人认同，还有民族的集体性身份问题。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无疑是最重要的认同之一。民族认同是人们对自已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表明一种文化归属，是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国家认同是对国家宪政制度的认同，是对国家归属和效忠，三者密切关联。

1. 民族与认同

“民族”是一个有具体历史规定性的范畴。斯大林说：“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②他还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也就是民族认同的四个基本要素。

安东尼·史密斯注意到民族发展的地域性文化历史特点，区分了西欧的“民族的市民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和亚洲与东欧的“民族的族群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前者包括民族的四个方面：(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即“公民权”(citizenship)的构建；(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后者包括：(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3)对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了法律。^④前者强调政治、法律因素，后者强调人们生存的共同体、本土文化和血缘关系。在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史密斯试图概括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定义：民族“是一个名义上的人类群体，分享一个历史形成的领土、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公共的大众文化、共同的经济和所有成员的共同法律权利和义务”。^⑤

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分类，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显然趋向于“民族的族群模式”。然而，无论哪一种民族模式，民族认同都

离不开“文化认同”这个要素。世界上各民族在繁衍和发展的进程中因生存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性，展示出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遗产积淀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民族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心理感情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构成民族性的物质和精神特质。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显示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展现了其民族个性、气质和智慧。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⑥并且说“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⑦赵光远明确指出：“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⑧盖尔纳明确主张“用共同的文化来界定民族”。^⑨

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就是形成民族这个文化—政治共同体以及民族认同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实现民族一体化。一些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即族群（ethnic group）^⑩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相互交往，不断融合，日益趋同，形成共同的语言、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心理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共同利益等。他们的生存空间确定下来，并且在同其他族群的交流中，意识到他们所具有的而有别于其他族群的特质，从而产生一种认同感，于是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同质”共同体——现代民族。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认同”不是现实的而是人为构建的，贝尼迪克特·安德森就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⑪。血缘关系常常被视为民族的一个基本要素，但是现代民族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性认同的符号本身”，反映出文化—政治属性。费孝通先生说，民族认同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⑫也正是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上说，“任何足够大的人群，其成员自视为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将被作为民族来对待。”^⑬

近代以来，有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说法，把民族和

国家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重合的部分，但是各自的内涵和着重点不同：民族是依靠文化和政治纽带而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和领土，国家则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是拥有明确的领土和国民、对内对外代表主权的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民族侧重于心理文化方面，国家则着重于公民们之间的法律和科层制联系纽带。“民族国家”带有二者的基本特点。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行政治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⑬ 国家对内维护法律秩序，对外在“无序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而保护人民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维护人民物质和精神的安康。

与民族构建相比，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是权力集中和法律化。在西欧，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结合在一起，将国家和民族融合起来。当民族与国家两者合为一体，即国家内只有单一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与民族居住地范围相同，而且文化与政治已经逐渐融合，便形成了民族国家。^⑭ 公民权的扩大在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民权使个人拥有了国民身份，获得了法律上诸多平等的权利，并且得到国家的保护，从而造就了高度的政治忠诚。法律上的公民身份超越了血缘、地方和宗教的身份，国家认同超越了血缘、地方和宗教认同。“公民权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种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分离的政治认同，它是多元文化的一把政治保护伞。它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政治联系，一种比种族联系和地域联系更加广泛的联系。因而，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方法，一种将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⑮

民族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形态首先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相比，民族国家具有更强的民族凝聚力，是动员和集结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最合适手段。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民族国家的

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由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生存环境、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非西方社会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路径各有特点。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可以是同步进行的，也可能是民族构建先于国家，还可能是先完成国家构建，再运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创造、形成民族共同体。^①

2.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认同”是人们对于相同和差别的观察结果和主观意识，是对（真实的或想像的）相同和差别的推论性表达。认同以物质或精神方面的相同性为基础，但是相同性并不等于认同。只有通过观察和辨识，一个群体的成员发现他们共有的基本特征以及同他人的差别，才会产生认同感。这种观察结果无论是基于可证实的事实还是想像，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由此而确定并宣称“我们是谁”。就民族认同而言，既是基于一个民族固有的一系列特征，又表明了对那些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征的主观认识。所以，费孝通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之别”形成的过程，而梁启超则把它看作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②不同的民族各有固定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民族的集体特征由民族成员在共同意愿基础上建构起来并反复出现，客观地构成了文化差异。一个民族所拥有的那些文化特质是民族的身份标志，因此成为创造民族认同的内在力量。

民族认同意味着民族成员主动接纳和认同本民族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主观归属感。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民族文化产生于民族成员的历代生活实践，在长期的延续中不断丰富，成为一套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规范，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个民族是以同一文化模式进行社会活动的，而一个人生来就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民族文化的教化和熏陶，经过社会化过程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产物。同一民族的成员可以根据这一模式预知和理解彼此的行为意义，不会发生误解。